

最高指示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 and 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薄一波反党反社会主义 反毛泽东思想的一百三十条罪状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是工交系统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头号人物。十多年来，他利用窃据党和国家高级领导职务的地位，打着“红旗”反红旗，干了许许多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他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他所把持工交口的工作中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把工交企业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积极参与制订和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破坏文化大革命，犯下了严重的反党罪行；他是个野心家、阴谋家，在组织上一贯搞宗派主义，招降纳叛，结党营私，重用坏人，妄图变天；在一九三六年叛变时，写了恶毒透顶的反共声明；在生活上糜烂透顶，臭气熏天；等等。他是埋藏在党内的一颗危险的定时炸弹。揪出薄一波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个伟大胜利！他的罪行累累，现据国家经委、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革命同志大字报已揭发的罪行，综合一百三十条如下：

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1) 反对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另搞一套，企图对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同样税收，助长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2) 他是一九五六年“反冒进”錯誤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他說：“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設投資太多，規模太大，不僅基建計劃難以完成，而且會造成若干方面的失調，會造成人為的緊張”等等。而在南寧會議批判“反冒进”錯誤時，他却把責任全部推到別的同志身上，自己偽裝成一貫正確。

(3) 早在一九五二年三反運動中，他就說過：“以後不再搞這樣的政治運動了”。一九五六年他又大講階級鬥爭過時了，說什麼“資產階級改造了，今後主要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

(4) 有一年雙輪雙鐮犁生產多了一些，他就借題發揮地攻擊說，毛主席只能給總路綫批“條子”，具體條子他不能批。

(5) 一九五九年，他為了給反對總路綫、大躍進找根據，他指使反黨分子馬洪搜集“理論”根據，寫了一個有多少錢，有多少物，辦多少事的資料送給劉少奇，他們並詳談了一次，劉少奇給他做了不少黑指示。

(6)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在北戴河會議上提出要大辦鋼鐵，開始他是公開反對，後來則陽奉陰違。

(7) 一九五八年八大二次會議以後，他同毛主席提出的總路綫、大躍進搗亂，鼓吹鋼鐵翻番，主張高指標，大搞瞎指揮。當這些錯誤受到毛主席和黨中央批評時，他一方面把責任推給別的同志，另一方面大吹冷風，搜集和散布反面材料，竭力反對大躍進。他攻擊大躍進是虛假的，是“寅吃卯糧”，甚至是“寅吃辰糧”；說什麼“工業增產百分之六十六，同幾千萬人上山對農業造成的損失相比究竟是得多，還是失多！”

(8)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前，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孫冶方、馬洪等人收集了不少關於“比例失調”等反對大躍進的“炮彈”，準備到會上攻擊我們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但由於他去晚了一些，那時已開始揭發彭、黃等人的反黨罪行，他見勢不妙縮了回去，企圖未能得逞。

(9) 廬山會議後，他又大搞高指標、瞎指揮，大吹浮誇風。一九六〇年他違反毛主席關於事物總是波浪式發展的教導，提出“開門紅”的所謂生產直綫上升的錯誤口號，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10) 一九六〇年他違反毛主席關於技術革命的教導，大搞煤氣化等瞎指揮，把事情搞亂以後，他又到處反對技術革命。胡說什麼“技術革命把技術都革掉了”。

(11) 一九六〇年，特別一九六二年以後，他聲嘶力竭地到處詆毀和反對大搞群眾運動，反對大躍進，到處吹陰風，潑冷水。對小土群大殺大砍；反對小化肥。他還在各種會議上大講大躍進的“笑話”，並說什麼“群眾運動不等於群眾路綫，不能運動群眾”等等謬論。

(12) 在調整時期，他對抗中央的八字方針，散布悲觀情緒，他只片面地抓關停併轉，搞了一個大收縮，把許多重要建設項目都停了下來。

(13) 反對人民公社，贊成單干。一九六二年他去山西農村考察後說：“山西農村單干的情況很多，這有什麼辦法，因為我們的公社辦得不好嘛。”並十分欣賞反黨分子馬洪寫的誣蔑農業集體化、鼓吹單干的材料。

(14) 直到一九六五年，他還繼續攻擊大躍進說：“大躍進生產了××××萬噸鋼，

但不頂用……，光吹牛怎么行！”

(15) 一貫主張生產指標越低越好，經常宣傳“以質勝量，以少勝多”的謬論。

在主持工交口工作中貫穿着一條 反革命修正主義的黑線

(16) 反對突出政治，鼓吹政治落實於業務，政治為生產服務的謬論。

(17) 強調工交部門的特性，抵制和反對毛主席關於全國大學解放軍的指示。

(18) 對毛主席關於工業學大慶的指示，陽奉陰違，對推广大慶經驗百般刁難。

(19) 反對毛主席關於不破不立，先破後立的革命學說，鼓吹先立後破的修正主義謬論。

(20) 反對毛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關於形勢、矛盾、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指示，一九六二年底在廣州工交會議上只字不提階級鬥爭。

(21) 搞修正主義的企業管理綱領——“工業七十條”，反對毛主席提出的“鞍鋼憲法”，反對加強黨的領導，反對政治掛帥，反對大搞群眾運動，反對技術革命，反對“兩參一改三結合”。還指使反黨分子馬洪主編修正主義大毒草——《中國社會主義國營工業企業管理》一書，並用他個人的名義發信為其推薦捧場。一九六五年被迫修改的“工業七十條”仍是修正主義的貨色。

(22) 頑固地強調企業是經濟組織，反對把企業辦成革命化的大學校。

(23) 反對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關係的指示，在工業管理和物資管理等方面，片面強調高度集中壟斷，扼殺地方辦工業的積極性。

(24) 反對毛主席親自主持擬定的二十三條，搞修正主義的“北戴河四清工作會議紀要”，破壞工交系統的四清運動。

(25) 反對中央的大中小同時並舉的方針，反對小土群，反對小鋼鐵和小化肥。

(26) 抵制毛主席提出的“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方針，抵制毛主席關於農輕重的指示，他對這些極為重要的指示，既不作認真研究，又不作任何具體部署。

(27) 反對按照毛澤東思想辦企業走中國自己的道路，片面鼓吹和美化資本主義的企業管理方法，堅持要派代表團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學習托拉斯等方面的企業管理方法。

(28) 反對和抵制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不傳達，不貫徹。

(29) 企圖在工業上也實行單干，在企業搞“五定、五包”。

(30) 反對政治統帥經濟，鼓吹用經濟辦法管企業，管工業。

(31) 搞大慶展覽時，為劉少奇、鄧小平歌功頌德，並突出他個人的“功勞”。

(32) 反對自力更生的首創精神，提倡爬行哲學和奴隸主義。

(33) 在組織上推行變相的一長制——總工程師、總會計師負責制。

(34) 在工交企業大搞物質刺激，甚至主張學習南斯拉夫，把少用人而剩餘的工資留給企業自己支配。

(35) 在工資政策上片面強調按勞付酬，抵制毛主席提出的逐步縮小工資差別的政

(36) 片面强调重在表现的阶级路线，到处鼓吹大盗窃犯王烂文的“功绩”。

(37) 片面强调专业化协作并使之绝对化，消极对抗毛主席提出的综合利用的方针。

诬蔑和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38) 一九六四年当有人提出职工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时，他竟说：“不要把学习毛著作庸俗化了”。他还常常攻击林彪同志“带着问题学”的指示说：“带着问题学，有了问题，学毛著作能解决问题吗！”

(39) 不相信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结果，说那是“总结”出来的。他说，“我就不相信学了《愚公移山》革命干劲能有那么大。”

(40) 反对宣传、学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反对把刘美全的英雄事迹登报。

(41) 不准他家警卫班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说他的家不是学校。

(42) 赞同罗瑞卿的谬论，反对提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43) 当他去看某生病的同志时，他问该同志尽看些什么书，该同志答学毛选，他不以为然，叫人家看《金瓶梅》。

(44) 反对在工厂、车间挂毛主席语录。当他看到一个车间里挂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就对企业负责同志训斥诬蔑说：“这是提倡发生事故。”

(45) 前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郑天翔在一次会上诬蔑北京有个汽车队，在运煤的时候，工人在煤堆前面集体朗读《愚公移山》，越读越没劲。他对郑的这种谬论却大加赞赏。

(46) 强调领导干部学习毛著作主要是解决工作方法、思想方法问题，抵制学习“老三篇”，改造世界观。

(47) 在组织各部部长学习政治经济学的“读书会”上，不去认真学习研究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却大量推荐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整理的苏修和南修的所谓经验。

(48) 积极配合旧中宣部“闖王殿”，兴致勃勃地用公款给局长以上干部买三十本经典著作，抵制学习毛主席著作。

参与制定和积极推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顽固地对抗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49) 积极参与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顽固地坚持推行这条路线。

(50) 毛主席已明确指示，搞文化大革命要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他却要让工交各部大派工作组，加强工作组，镇压群众，实行白色恐怖，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51) 七月上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同志到轻工学院发现“反干扰”的错误之后，要工作组向他和陶鲁笳反映这个问题，但他们不但不听，反而支持该院工作组向中央反映戚本禹同志的所谓缺点，企图倒打一耙。

(52) 在刘邓召集的汇报会议上，极其猖狂地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同志的正确意见。

(53) 七月二十四日当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后，急急忙忙地策划召开工交党委，蒙蔽和欺骗各部领导同志，煽动大家反对撤销工作组。

(54) 七月二十五日继续布置收集关于在林学院“反干扰”是“正确”的材料，继续对抗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55) 七月间，他给地质学院工作组关于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的反动批示广播后，遭到革命师生的强烈反对。七月中旬他被迫将批示送伯达、康生同志审查时，竟篡改了这一批示的原文，企图欺骗中央，减轻罪责。

(56) 八月三十日做假检讨，欺骗中央。

(57) 抵制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批评，百般地掩饰和坚持错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大讲指导各部运动是正确的，对抗全会的批评。

在高等院校制造白色恐怖，残酷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58) 他是派工作组到院校去灭火的最坚决的干将，仅他在工交口派出的就有六千名之多，有二十五名副部长和政治部正副主任当了工作组的眼目。

(59) 煽动群众和策动清华工作组把蒯大富等革命同学打成“反革命”。

(60) 策动“反干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右派”、“假左派，真右派”、“超左派”，实行白色恐怖。

(61) 胡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党”，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学生运动提供理论根据。

(62) 亲自批示开除反对他的“指示”的革命同志的党籍。

(63) 当革命师生反对工作组时，他亲自出马，到处保工作组，挑动学生斗学生。

破坏工交各部的文化大革命

(64) 运动一开始，就散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种种谬论，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提出什么“眉毛胡子一把抓”，“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大风高温，分层烧透”；“两类矛盾一起抓”。并大肆宣传大叛徒梁鹰庸的十分荒谬的十项措施。

(65) 运动开始后不久，就为某些部长、副部长定调子、打保票，压制群众揭当权派的问题。

(66) 到处煽阴风，点鬼火，把运动前期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责任推到各部领导同志身上，自己以“左派”自居，企图捞取政治资本，蒙混过关。

(67) 在化工部与大叛徒梁鹰庸共谋，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革命的同志。

(68) 说一轻部是“黑暗系统”，破坏该部文化大革命。

(69) 支持林业部×××，把曾经批评过部党委的政治部的一些同志打成“反党分子”。八月六日又伪装“左派”，为政治部的同志翻案，把责任完全推到×××头上，仗势压人。

(70) 借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对抗中央指示，企图整他所不满意的部长。

(71) 工交口某些部門的文化大革命被他弄乱后，他借口“大事请示中央，小事各部自定，各部要独立作战”，企图脱身推卸責任，溜之大吉。

(72) 故意不抓生产，給文化大革命抹黑，唯恐天下不乱。

竭力镇压经委和工交政治部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73) 在經委和工交政治部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顽固地推行一条保护他本人和他的死党，矛头向下，镇压革命群众，轉移斗争大方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机关运动控制极严，一方面，在关键时刻，他亲自出馬，赤膊上阵；另一方面，他指派亲信操纵前机关文革組織，镇压群众运动，迫害革命干部。

(74) 馬洪、梅行是薄一波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員，运动开始后，他千方百计抵制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揭发、批判和斗争，包庇他们，保护自己。

(75) 运动初期，他亲自指揮把企业管理局的給他和他反党集团的成員提意見和批判“七十条”修正主义观点的庄靜同志打成“反党分子”；把与庄靜同志进行革命串联活动的同志们都写入所謂“反党大事紀”，当作“反党苗子”。

(76) 派工作组到編研室、办公厅、印刷厂整革命群众。

(77) 借經委革命群众自发給计委送大字报一事，大做文章，制造恐怖气氛，一方面企图借此来压服我委的革命群众，扑灭刚刚要燃烧起来的炮打司令部的革命烈火；另一方面是向李富春、余秋里两同志故作姿态，掩盖他的反党面目。

(78) 亲自出馬和指使他的爪牙放出不許批判工业“七十条”的空气。

野心勃勃，到处伸手，扩大权势

(79) 成立和把持工交党委，把工交各部置于他的严密控制之下。一面对抗计委、科委，一面又阴谋把大型企业的党的关系收为工交各部直屬。积极策划搞“工业党”，独揽工业、交通方面的党政大权。

(80) 反对把物资部交給计委领导。

(81) 竭力主张要把计委的年度計划工作攬过来。

(82) 抓財权，要管三項費用和新技术进口的外汇。

(83) 抓《經濟消息》，企图把《經濟消息》变成宣传他的謬論的工具。

(84) 通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治方、馬洪等人控制經濟研究所，企图使这个所完全变成为他制造修正主义輿論的工具。

(85) 搞政治交易，以任命徐运北为部长来换取他老婆胡明当二輕部的党委成員并局长。

(86) 几乎每年都叫馬洪等反党分子为他写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一方面是为了宣传他的謬論，一方面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經濟理論家”，吹嘘自己，抬高身份。

(87) 叫人給他写回忆录、小說，为他自己树碑立传，为实现他的政治野心作輿論

准备。

(88) 建委成立时，积极活动企图把建委划归工交口领导。当他的野心不能得逞时，就百般刁难，给建委制造困难。

两面三刀，继承了阎锡山的衣钵

(89) 他原是试办托拉斯最积极的，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他却说他本来就是反对办托拉斯的。

(90) 他本来是很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但在彭、陆问题被揭发后，为了掩盖他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反动面目，却急急忙忙地召开了一个技术人员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座谈会。

(91) 在八月六日林业部大会上，有人发言时说：“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薄副总理来参加会，我们感到很荣幸。”他听了以后却心安理得，妄图鱼目混珠。

(92) 科委张本同志写信请他转给总理揭发韩光压制民主的错误，他假意表示同意，其实他不但未报告，反而将此事密告韩光本人。后来他听到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张本同志，他便一面接见少数派的陈仲田同志表示假支持，一面马上又去与韩密谈。这充分暴露了他政治掮客的两面手法。

(93) 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打击别人，吹捧自己。经常说这个不行；那个老了；这个犯过什么错误；那个事务主义，作风拖拉等等。

(94) 在参加中央会议时，记下别人发言时的表情，作为整人的依据。

(95) 为了进行政治投机，经常记下自己对形势和重大问题的看法，当形势发展证明他的意见是谬论时，他就改正后付印，以欺骗别人，伪装一贯正确，捞取政治资本。

(96) 与计委作对，借机为难计委。

与大党阔彭真等勾搭，进行阴谋活动

(97) 与大党阔彭真的关系十分密切，是彭真的一伙。两人常有密谈。他和彭真勾结在一起，一唱一和，反对“二十三条”，搞修正主义的北戴河“四清座谈会纪要”。彭的反党罪行被揭发后，他神态十分紧张。八月六日他在钢铁研究院还包庇彭真，说他只是犯了方向的错误。

(98) 与反党分子安子文关系十分亲密，安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搞到的中央机密文件都要送安阅。他曾这样说过：“干部问题好办，打一个电话就行了。”彭的反党罪行被揭发后，薄、安和×××十分惊惶，曾密谋多次。

(99) 与反党分子杨献珍关系十分密切，称杨为“我们党的理论家”，他发表的文章大都要先送杨审阅，如他的《千万不要忘记》的剧评送杨审阅时，杨加上“合二而一”的谬论，他曾表示同意。

(100) 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行被中央揭发后，他通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梅行把党和国家的机密洩露给×××。

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101) 他一貫搞宗派主义，到处安插亲信，触角伸得很长。和工交系統、国家經委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結成了反党集团。

(102) 包庇重用叛徒，如梁膺庸等；包庇、重用反党分子，如馬洪、梅行、李哲人、孙冶方、刘秀峰等。

(103) 把持經委党組，排斥“异己”，培植亲信。

(104) 把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婆长期窝藏在他家里。

独断专行，搞家长式統治

(105) 他在工交党委和經委党組中根本不实行集体领导，搞一言堂和家长式統治。

(106) 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濫用职权，他个人擅自决定停止某党組成員参加党組会。

严重泄露党的机密

(107) 严重违反中央保密制度，把中央的絕密文件（包括主席的内部讲话），私自印发，并給老反党分子馬洪等人看。

(108) 把中央的机密文件經常給他的儿女看，甚至让他们拿到学校里去，秘书提出意見，他置之不理。

腐朽透頂的资产阶级老爷生活

(109) 几年来借了公家大量的錢，措了不少油，蒐藏了許多古典黄色书籍，玩物丧志。

(110) 教女儿繪画、唱戏、学古詩、学外文，就是不教他们学毛主席著作，不遗余力地培养修正主义苗子。

(111) 他和他老婆胡明是走后門的专家，一九六二年底去广州时，走后門买了大批东西（有的是措油来的），装了一个車廂，由专人押送回京。

(112) 把他家里的工作人员当作奴隶，动輒訓斥。

(113) 酷爱香港的电影、画报、报纸、书刊，热衷于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

(114) 是封建主义的孝子賢孙，将早已死去的父亲移与其母并葬。

(115) 违抗毛主席的指示，为自己摆筵祝寿。

(116) 出差时吃得要好，出錢要少，是个措油专家。

(117) 对国家资財揮霍无度，几年来修房子就花了二十多万元。

(118) 他和他老婆每月有几百元的工资，每月还定期补助二百元。另外，几年来还要公家补助了近二千元。

(119) 他主持的全国性的会議，总是找种种借口，慷国家之慨，大吃大喝。

(120) 困难时期用公家的饲料大肆养鸡，自己拿着鸡窝钥匙，怕人家偷鸡蛋。

(121) 现在家里单是人参就有一大箱，一大缸。

(122) 出国时，特到故衣店用金线龙袍料子做了一件睡衣。

(123) 出差西北和主持广州会议回北京时，原已要了飞机，后因买的东西太多，飞机装不下，又改要专车，大量浪费国家资财。

负隅顽抗，妄图反扑

(124)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他看到揭发他的材料时，十分不满，向秘书同志说：“这都是由于我保人家保的。我没有什么，我心里明白。”还说：“这几年的工作，自六二年以来基本上是正确的。”

(125) 中央十一中全会对他提出批评，他就以“挂冠”来对抗毛主席和党中央，给毛主席写信，提出要取消各部，成立四委，解散经委，并提出辞职。

(126) 竭力封锁消息，不许传达十一中全会点他和陶鲁笏名的问题，全会的文件也不向党组成员传达，妄图压住他的反党问题的盖子。

(127) 直到他的盖子被揭开后，他还坚持说，他对化工部运动的指导是正确的，竟胡说不这样处理，梁庸暴露不出来。

(128) 到十月二十七日，他仍毫无低头认罪之意，当秘书谈到大家对他搞家长式领导意见很大时，他大怒说：“屁！我领导工交口这几年，是紧跟毛主席的。我的问题就这么多，我心里明白。”

(129)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出要收集他在运动中的批示和讲话，他为了消灭罪证进行抵抗，竟烧毁了大量文件。

(130) 十一月二、三两日，他两次给秘书打电话，打听运动情况。当他听到不能向他反映任何情况时，他在电话里气势汹汹地说：“我知道了一些情况，我站在梁庸这一边，不站在高扬这一边，这也算一条罪状！‘大风高温，分层烧透’，这也算一条罪状！”他还提出要一个助手搜集一九六二年以来经委召开的会议的文件和运动中对他的意见，帮他写材料。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国家经济委员会《东方红战斗队》

国家经委印刷厂《革命工人战斗队》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